

唐蕃舅甥关系述论

周 毅

(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唐朝通过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入蕃和亲,与吐蕃缔结、发展了舅甥关系,本文以这种亲属关系上升到的舅权制为切入点,阐述汉藏民族以儒家伦理为纽带,形成伦理体系的认同,为藏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感情基础和心理基础。

关键词 唐蕃关系 舅甥关系 舅权 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09)01-0039-04

一、唐蕃舅甥关系的缔结

唐初,大唐帝国以其高度的政治威望和繁荣的经济、文化,赢得了周边诸民族的内向。西域高昌、西突厥、吐谷浑、党项、白兰、东女等部与唐朝通好或称臣内附。处在大唐西部的吐蕃王朝降服达布、工布、娘布、苏毗等部,统一了青藏高原。吐蕃赞普在对内致力于吐蕃内政建设的同时,对外也在寻求建立和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睦邻友好关系。

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朝朝贡,这是吐蕃首次遣使入唐。太宗闻赞普“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1],派遣行人冯德遐入蕃抚慰,由此拉开了唐蕃关系史两百余年友好往来的序幕。松赞干布见到大唐使臣,甚为喜悦,得知突厥与吐谷浑都与唐朝联姻,便派遣使者随唐朝使臣冯德遐返唐,“多赍金宝,奉表求婚”^[1],然而太宗并未答应。吐蕃首次请求和亲并未得到唐朝认可,究其原因,或许是唐与吐蕃初次互通使节,对于刚建立的吐蕃王朝,尚缺乏深刻的了解。吐蕃使臣回到吐蕃,向赞普诉说请婚未成在于吐谷浑从中离间唐蕃关系,松赞干布大怒,连同羊同出兵,攻打吐谷浑,大肆掠夺其人畜。又“率兵二十万,屯于松州西境。同时,遣使者向唐朝贡金帛,云来迎公主。”^[1]松州之战,最初唐朝失利,直至左卫将军牛进达率兵夜间偷袭吐蕃军队,斩吐蕃将士千余人,松赞干布大

为惊恐,才引兵退走。公元639年,松赞干布遣使入唐谢罪的同时,再次向唐请婚。通过松州之战,太宗认识到吐蕃军事实力的强大,唐蕃的修好有利于唐朝西部边疆的稳定,于是应许和亲之事。次年,吐蕃大论禄东赞率领数百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入唐,“献黄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事以为聘”^[1],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标志着唐蕃舅甥关系缔结由此开始。

公元641年,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奉太宗之命主婚,护送文成公主入蕃。李道宗也是唐王朝向吐蕃派出的职位最高的使臣,由此可见对此次和亲的重视。松赞干布亦亲自至河源迎接文成公主,“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1]。鉴于此时李道宗的身份象征着大唐王朝,松赞干布则代表的是吐蕃王朝,“子婿”一词,概括了双方政权进入了“舅甥之国”这一划时代亲谊之中。待回到吐蕃,松赞干布自豪地向诸臣夸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1],于是建造宫殿而居住。吐蕃百姓多为过着游牧无定的生活,虽然建有城堡,但贵族仍居于毡帐之中。为公主修建宫殿居住,推动了吐蕃弃牧从农,对吐蕃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吐蕃开始派遣贵族子弟,入唐朝国子监学习儒家经典,而赞普本人则仰慕华风,释毡裘,着纨绮。纵观此次吐蕃与唐朝的联姻,双方先战后婚,其中也不乏吐蕃追求

[收稿日期] 2008-10-26

[作者简介] 周毅(1984-),女,湖南株洲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

民族互相尊重的积极历史意义。

公元649年,唐遣使者入蕃告太宗丧、高宗立,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遣使入唐吊祭与贺立,并致书于长孙无忌等曰:“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1],并献金银珠宝请置于太宗灵座之前,继而,高宗又晋封松赞干布为驸王。太宗葬于昭陵,雕刻松赞干布石像,与太宗的功臣贵族石像一同列于昭陵玄阙之下。对吐蕃这种待遇,确实非比寻常。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卒,其子早死,由孙芒孙芒赞继位,王朝政事全委托大相禄东赞处理,从此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禄东赞家族专权时期。公元658年,吐蕃遣使入唐请婚。公元679年,又遣使入唐为赞普请婚。吐蕃屡次要求和亲,终因双方军事冲突不断,和亲之议均为高宗所拒。至公元703年,吐蕃赞普赤都松又“遣使献马千余匹,金二千两以表求婚”^[1],此次武则天则应许了。唐蕃近三十年的争战,让唐朝甚感筋疲力尽,也希望能与吐蕃改善关系,无奈赞普出征讨伐蕃属叛乱死于军中,和亲之事因此搁置。新任赞普赤德祖赞年少继位,由祖母没庐氏辅政。为安定王室内部争权,获得唐朝的支持,于公元707年,派大臣悉董热入唐朝贡,为赞普请婚。时中宗也接位不久,为“边土宁宴,兵役服息”^[2],允吐蕃和亲之请求,封养女暨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许嫁赞普。公元709年,吐蕃赞普祖母遣使向中宗献宫室之物,以表谢婚。数月之后,吐蕃重臣尚赞吐率一千余人至长安迎公主,规模之庞大,堪称罕见。

中宗就此和亲下达诏书,制书称“强汉乘时,建和亲之议。斯盖(御)宇长策,经邦茂范。朕受命上灵,克纂洪业,庶几前烈,永致和平。”^[1]表达了唐方面以和亲带来和平的祈望。中宗命左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并亲自送公主于始平县,设宴饯行,命诸从臣赋诗饯别。同时,大赦始平县,免徭役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其地为凤池乡,枪别里。以此纪念唐蕃再续舅甥之好。

次年,睿宗继位后不久,便册立金城公主为长女。此举无疑加深了唐与吐蕃两王室之间的舅甥情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联姻,始结了唐蕃的“舅甥关系”,至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之时,这种舅甥关系发展到了极致。在唐蕃通往的书信之中,舅甥情谊体现得淋漓尽致。吐蕃致唐书信中尊唐为“皇帝舅”,而自称“外甥”。赞普赤德祖赞曾向唐三进和好表,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逐和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1]唐玄宗《敕吐蕃赞普书》中说到“缘国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为子婿”。^[3]名臣独孤及在代皇帝《敕吐蕃赞普书》中,也说到“敕吐蕃赞普外甥,

朕共赞普,代为与国,自我玄宗至道大明孝皇帝,与甥赞普和亲结好,将六十年……使代代子孙,为兄弟甥舅,如手足相卫,唇齿之相依”。^[4]

唐蕃双方多次重申“舅甥”关系,意在强化双方的“舅甥”情谊,加深双方的感情,打破彼此的心理壁垒。“和同为一家”更是在思想意识领域初步奠定了西藏认同全中国大一统的基础。

二、舅权制的体现

“舅、甥”之间充满着亲谊的表示,而“舅、甥之国”则由舅、甥之亲扩展而来的。即两个王室通过政治和亲缔结亲属关系,扩展到统治集团,互称两国为舅、甥之国。把国加以人格化,其主旨在于和睦亲族、敦睦邦交,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国”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含义并不相同。这个时候的“国”泛指政权。)舅、甥本是一种亲属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和家庭经济下就上升到了一种权利制度,这就是舅权制。舅权制的产生是多方面的,最为通行的是“舅权制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和遗留”。而吐蕃社会正是由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转型时期,因此,舅权的地位和权利就越发明显。

作为一种制度,舅权制形成之时就拥有其自身的价值功能,对社会稳定、民族凝聚力都具有一种加固稳定的社会功能。想要了解这种舅权制对社会发展稳定的作用,就要从舅甥关系入手。

舅甥之间既然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亲属关系,就必然要派生出一些相应的关系。舅舅是外甥的至亲者,外甥也是舅舅的至亲者。只要双方都有一个一致的认同,这种关系就能长时间的维持。

因为唐朝是吐蕃的“舅舅”,是吐蕃的至亲者;吐蕃是唐朝的“外甥”,也是唐朝的至亲者,就有那年复一年往返于长安与逻些的众多使臣,他们身上担负着维系舅甥之情的责任,其频繁的使臣往还次数与人数,在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甚为罕见。

有关唐蕃舅甥之间使臣往返初步统计,自公元634年至公元842年的二百余年间,蕃使来唐有一百八十余次,唐使入蕃有一百余次。出使的任务有盟会、朝贡、求请、求和、约和等。频繁的使臣往来,既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包含了很大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成分,但从更深层次意义上来说,这是舅甥感情亲密程度的外在表现形式。

公元647年,龟兹王侵犯唐朝边境,太宗遣使持节命吐蕃与突厥、吐谷浑连兵进讨龟兹。吐蕃为唐朝“子婿”之国,就有义务有责任共同出兵讨伐龟兹以保证舅家的利益。之后,唐朝王玄策出使西域,被中天竺所劫。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吐蕃立即发

兵援助,与玄策共击天竺。

松赞干布在唐太宗病逝后曾致书长孙无忌表示“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的忠心。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时,吐蕃遣使于灵武,向肃宗“请助国讨贼”,愿出兵助唐平乱。次年,吐蕃再次遣使入唐,请求助唐平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又发生朱泚叛乱,吐蕃大将尚结赞遣使入唐,请求出兵助唐讨伐朱泚。唐遣秘书监崔汉衡入蕃,吐蕃发兵助唐平息叛乱。这些无疑揭示了外甥有义务和责任以出兵讨伐活动来保证舅家的利益。

舅权不但指一个单纯的家庭内部里母亲兄弟的权利,很多方面这种权利上升到族的高度。舅权上升到族的高度时,外甥是不能冒天下大不韪与舅家断绝关系。尽管吐蕃与唐朝军事冲突不断,而且大多由吐蕃挑起并给唐朝造成较大损害,但是始终不割舍与唐朝的舅甥情谊。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双方举行会盟,以后实现一段时间的和平,不久战争又起,如此循环往复。

所以,会盟作为唐蕃舅甥双方政治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双方战事的补充,几乎贯穿于双方关系之始终。唐蕃会盟始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止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共8次。最后一次的“长庆”会盟,又称为“舅甥和盟”。从政治层面上看,它标明了吐蕃和唐朝之间“社稷如一”的亲密关系;从亲属层次上看,通过会盟的互动,重申舅甥之情,达到双方政权的稳定。

由于是通过自然法确立了舅权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抗拒舅权就是抗拒自然法,抗拒习惯法。

松赞干布由“西海郡王”晋封为“赞王”,象征着唐朝首次对吐蕃实行其舅权所拥有的“法力”。发展到吐蕃后期,“法力”的效力范围扩大了。公元842年,达磨赞普死,由于无子,便立妃琳氏兄尚延力之子为赞普,并未向唐朝请封得到“册命”,大臣论恐热说:“贼舍国族立琳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9]公元851年,论恐热欲率军降唐,对众人说:“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10]由此可见,获得唐朝皇帝的册封已成为赞普合法即位的首要条件。也正是唐朝舅甥拥有这种舅权,才有在史书上经常出现的皇帝舅对赞普外甥使用的“赏赐”、“封授”以及“吐蕃使臣朝贡”等字样。

从本质上说,舅权制是一种文化现象,除了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之外,还受其地域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唐蕃两个政权的舅甥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舅权制,是由舅权-族-法组成的三位一体,具有长时间稳定作用。只有汉藏两民族在文化遗产和伦理体系上形成一致的认同,才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加固稳定的作用,也才能使藏民族自觉自愿地融入中国统

一多民族的大家庭中。

三、汉藏民族的伦理体系认同

公元7世纪,唐朝在结束中原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后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它不但是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疆域最为辽阔、人口最多、国力最强盛的大国,而且还以其悠久、发达的历史文化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

吐蕃在松赞干布的率领下,降了达布、工布、娘布、苏毗等部,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军事联盟的奴隶制王朝。这样一个刚建立的王朝,与封建社会高度发达的唐王朝联姻建立舅甥关系后,中原先进的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被吐蕃所吸取,其深远意义是不可估计的。儒学则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经典源源不断传入吐蕃,儒家文化既为唐蕃两地人民之间心灵的沟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双方民族日渐加深的认同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唐蕃联姻缔结舅甥关系开启了儒家文化传入吐蕃的大门。文成公主入蕃是儒家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传入吐蕃。她不仅带去了大量经史、诗文等书籍,也带去了一些谙熟儒家文化的侍从。松赞干布对公主所带去的唐代礼仪产生倾慕,自己也逐渐接受这种礼仪制度,“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11]开始派遣酋豪子弟,远赴长安,进入唐朝国学学习,把学到的儒学知识、儒家伦理及典籍等带回吐蕃,对儒学在吐蕃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到长安学习的子弟,有的成为吐蕃重臣,如论仲琮、名悉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人毕生奋斗于维护唐蕃舅甥亲好关系。

至金城公主之时,是儒家文化传入吐蕃的又一个高潮时期。金城公主曾亲自上书唐玄宗,请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儒家典籍,唐朝官员于休烈认识到这些书籍将会对吐蕃的社会发展以及文化的提高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上书唐玄宗劝谏:“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若与此书,国之患也。”^[12]裴元庭则是加以反驳道:“圣慈含育,许其降和,所请书随事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不同,斯可致也。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13]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竭力将儒家的思想精华融入藏族社会中,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

汉语中最先并无“伦理”一词,“伦”意作类、辈分、顺序、秩序等含义,也可以引申为不同辈分的关系,“理”则具有分别、条理、道理、治理等意义。“伦

理”二字合用,最早见于《礼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伦理”二字,原指事物之伦类条理,而用于人类社会,就是人与人相处的道理,也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守的道德和规则。

儒家伦理是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人道理论。“仁”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爱人,二是忠恕。孔子认为无仁便无一切。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和做人的根本原则,礼则是人行为的根本原则。所以,仁是内心的德性,礼是外在的规范。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孝”为主要内容,确立了孝亲忠君这一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由孝及忠、忠孝一体。这是由于汉族伦理的一大特点是家族本位,表现在人伦关系中以家族血缘为原型,设计了整个人际关系。在社会伦理上,它使血缘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根基;在个体道德上,它使孝悌成为封建道德的核心;在思维模式上,它由亲及疏、亲亲尊尊为道德思维模式。它以血缘为最高价值,“亲”成为价值的始点与标准,血缘宗法是社会结构的原理,形成了一种家族式的集体主义。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忠、孝观念已完全渗入到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之中。

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伦理受到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不同社会形态思想的影响,其中以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为主,这与大量吸收儒家伦理思想成就有关。

据《西藏王臣记》载“松赞王在十善法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敬奉三宝、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心须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食、有恩必报、斗称无欺、不听妇言、和言善语、任重量宽等十六条正净的做人法规。”实际上,这是融藏族传统道德规范及汉族儒家道德规范为一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尤其是仁、义、礼、忠、孝思想的吸收,反映出汉族传统伦理纲常对藏民族道德标准形成的重要影响。

直至《礼仪问答写卷》的出土,向世人充分展示出吐蕃时期藏族人民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方法。此书以兄弟对话形式,详细而又全面地论述如何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人伦关系及如何待人接物与礼仪礼节,与汉族传统儒家经典《论语》、《礼记》等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相似或一致。

首先从忠孝礼观角度来看。忠孝是儒家伦理的最高准则,忠重于君臣之间,孝用于父母子女之间,而礼则是适用于一切的人际关系之间,是人们行为的规范。《礼仪问答写卷》把孝敬父母和师长并列,认为“儿辈能使父母、师长不感遗憾抱恨,即为最上

之孝敬”要求“父母养育了儿子,儿子孝敬父母,应如珍爱自己的眼睛一般。”如果“不孝敬父母、上师,即如同畜生,徒有人名而已”。上升到君臣之间,侍奉君主就是侍奉父母的继续。孝转换为忠,修身处世能够忠孝两全就是孝道的最终归宿。赞普赤松德赞就曾因唐代宗丧,没有吊祭,感到懊悔,德宗新继位,攻打唐朝,感到悔恨,因为自己做了违背君臣伦理之道之事。

其次从仁义观角度来看。吐蕃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要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奴隶制社会,主张以仁德施惠于民众,反对横征暴敛,一再提醒奴隶主阶级,役使要有度,自己也要“居高位而不欺凌”,对待奴仆“勿对之不爱惜、粗暴、作恶”,应更多地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而在义利关系上,始终坚持重义轻利的道德模式。认为“欲望至多,则会贪婪无边。贪得无厌,歪门邪道即由此产生”,由此导致“过分贪婪,使生命政事,皆受鄙视”之后果。对于不符合道义的一切利益都要给予抑制或否定,“不义之财,见之如鬼不善不乐。诱饵之食,见之欲呕而不觉其香。”总结出一条“对人有益,对己永远有利;危害他人,对己长远有碍”的义利真理。

《礼仪问答写卷》虽然带上了藏民族自身的传统伦理特征,体现出吐蕃社会统治阶层推行的道德伦理观念,但是更多的表现了吐蕃伦理对中原儒家伦理思想的兼容并收,其伦理体系对吐蕃社会的稳定和藏民族的形成起到过重要作用。

正是汉藏民族社会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一致,才使两民族对伦理体系才有了一致的认同。伴随着这种认同的加深,儒家文化的“大一统”观念的逐步强化,再加上唐蕃舅甥关系的不断加深,在这一时期,唐蕃往来文书和会盟碑中“同为一家人”表达了政治归一的用词频繁出现,使得藏民族跻身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

[参考文献]

- [1]《旧唐书·吐蕃传》[M].
- [2]《全唐文·卷十六》[M].
- [3]《旧唐书·玄宗传》[M].
- [4]独孤及《毗陵集》卷18[M].
- [5]《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M].
- [6]《新唐书·吐蕃下》[M].
- [7]《册府元龟》卷三二〇宰辅部识量[M].

[审稿 顾祖成]

[校对 梁成秀]

Halima's Kiblah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Birth of "Jianfutu"

Suo Wenqi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n the year 1407, Halima came to the capital for Kiblah, during this time, lent was arranged in Nanjing to "Jianfu (recommend fortune)" for Taizu Emperor and the Empress. For the activity was successful, Emperor Yongle conferred "Dabaofawang" on Halima and had the marvels painted out, hence the birth of the "Jianfutu" 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 and their personal friendship as well. It is also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us today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the motherl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Buddhism in inland China in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use of national characters.

Key Words: Emperor Yongle; Halima; Kiblah; Jianfutu (Fortune-recommending pic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Uncle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Nephew (of Tubo)

Zhou Yi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rough marrying the Princesses Wencheng and Jincheng into Tubo, the Tang Dynasty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ubo as maternal uncle and nephew. Taking the system of maternal uncle's power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thics system by both Han people and Tibetan people through the link of Confucian ethics. This recognition laid a strong emotional and mental foundation for Tibet nationality's melting into Chinese multi-cultural pattern.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ubo;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uncle and nephew; the power of the maternal uncle; Confucian ethics,

An Analysis on the Failure of the Tibetan Xinzheng Refor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hi Yunfeng

(Party School of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Lhasa, Tibet, 85000)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order to resist the imperialist invasion to Tibet and reverse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Xinzheng cultivation activity which aimed a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fter two experiences of exile, the 13th Dalai Lama decided to carry out Xinzheng but in vai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terialism historical viewpoint, the system factors of this failure lay in: feudal serfdom's restriction to social economy's development; the system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syncretism's restriction to the accommodating capability of the social changes, the resistanc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system to social changes.

Key Words: Tibet; Xinzheng reform; system factor